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緣起

很久以前，當我還是個大學生時，曾在某堂課上聽到老師談起 McLuhan (1964；葉明德譯，1978)「媒介就是訊息」的論點，當時，年輕的我只覺得這真是個有遠見的人，竟然提得出這樣的觀點，然後，就像許多學生一樣，把他的想法，當成是另一個已經考過不需再用的傳播理論，放到一邊，並且單純的認為，這個理論跟我不再相關，不用再去思考。

1999 年，生命中總在抱怨不喜歡讀書的我，開始進入博士班就讀，也開啓了進入學術研究的那一扇門，在一連串修課與參加研討會的過程中，我慢慢的走進了論文思考的情緒。某次，在與家人相聚時，母親談起了不識字阿姨的買菜情形，突然之間，曾經深埋在心中的震撼與疑惑開始湧現，而也從那一刻開始，開啓了我以 McLuhan 觀點為起點，對於文盲所做的探索之旅。

相較於一般傳統學者強調傳播「內容」對人類認知、行為的影響(例如：議題設定理論、涵化理論等。翁秀琪，1993)，McLuhan 在 1964 年出版的《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就明確的指出，媒介內容雖然對人類認知和行為會產生影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傳播「媒介」¹本身的發明與使用，對人類生活及感官思維所造成的改變。

在此，麥氏所說的媒介，不只是傳統媒介研究所定義的報紙、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還包括可供人類解決問題及達成目的的各式工具和技術，例如石器、鐵器、口語、文字、印刷技術等。McLuhan (1964；葉明德譯，1978：6) 強調，這些媒介工具不只為我們所使用，且在使用各式媒介的過程中，我們的生活及思

¹ 對於兩者影響力的差異，McLuhan 曾做了一個巧妙比喻。McLuhan(2001：136)認為，「傳播內容」是夜賊用來吸引看門狗注意的肉罷了，小偷真正的重點不在於肉，而在於房內的寶藏(即傳播工具)。

考方式，也產生重大變化。使用不同媒介工具的人，其思維及生活是以不同方式運行著，故而在口語時代，人們生活在一個聽覺世界，進入文字時代，眼睛反而成了最重要的感官工具了，而這些不同的感官經驗，又導引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生活形態，使人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著，故而媒介的發明與使用，對人類思維及生活發展，即是種重大訊息。

延續著 McLuhan 「媒介就是訊息」的說法，如果說使用不同媒介，會造成不同的感官、思考和生活方式的話，那麼或許研究者可以反過來進一步提問的是：

不使用某項媒介工具思考的人，其思維方式為何？是否與該項媒介慣用者有所不同？

在此研究中，我即是從 McLuhan 所強調的「媒介使用對人類思維所造成的影響」思考，更進一步將問題概念化為：

未受過文字教育，不使用文字做為思維和溝通工具的文盲，究竟怎麼去思考及傳播，而他們的思考和傳播方式又和受過文字教育的人有什麼不同？

二、初相逢

2002 年的夏天，延續著 McLuhan 的想法，我開始進行有關文盲思考及傳播方式的研究。在研究一開始，我將所謂的思維方式，設定在文盲的問題解決上，並以文盲的算數過程，做為觀察重點。我最先找到的研究對象，是住在台南縣某個小村落不識字的阿玉。

一開始，我的作法是提出一些類似小學數學課本裡的應用問題，請阿玉告訴我問題的答案。像是我問阿玉買五十三塊錢的東西，付一百元會找回多少錢？結果阿玉想了一下，告訴我答案是四十七塊；我又問她，買了三十七塊的水果，再

買二十四塊的青菜，總共要付多少錢，阿玉很快的回答我說，六十一塊啊。在發現她具有相當程度的運算能力後，我接著提了一個好奇已久的問題，即不使用文字和符號做為思考工具的她，腦中是怎麼進行算數運算的。

「妳是怎麼算的啊」？我認真的提問著，她一臉疑惑的看著我，想了一下，給了我一個令我震撼，卻又不能說錯的答案（或者可以說是對的答案），她說：

我是用心肝想的啊!²

一開始，我覺得她是不是聽不懂我的問題，我要的不是個用「什麼」工具思考的答案，而是一個數字運算的過程。我想，即使她沒有數字這樣的符號工具，她可能還是會使用其他的工具來做運算，像是「錢」，所以她還是應該回答我一個運作過程，像是先做什麼，再做什麼的一個過程(例如，先用一百塊減去五十塊，再用剩下的五十塊減三塊)。但是她並沒有。於是我想，也許自己問錯了問題，所以又換了個問法，企圖讓她更知道我在問什麼。

我問她，「那妳的頭腦裡，是先做什麼，再做什麼？」，她回答說，「沒有啊，就是這樣算，這有什麼好問的」。最後，我實在太好奇她腦中呈現的到底是什麼？(她一直沒說出來，或者她的腦中真如她所說的，什麼都沒呈現)，於是我大膽的問她，「妳頭腦裡有沒有出現什麼東西」，她回答我，「沒有啊，哪有什麼東西，就這樣算啊！」。

於是，我開始放棄從她口中套出運算過程的企圖，並進一步思考她的問題反應，我想：

是否文盲在口語表達和反應上，和我這個受過長期文字教育的人，在某些面向上是有差異的？

² 關於這個問題，其後我又追問了其他十幾位的報導人，得到的回答不是「我是用心肝想的」，就是「我是用頭腦想的」。

我當然不認為我們之間的表達方式有極端的差異，因為在溝通的過程中，大半時候她的回答和我沒什麼不同，而從她的回答中，我想，大半情境下，我們應能彼此理解，不過還是有些時候，有些溝通上的問題，那麼：

這些差異是顯現在哪些面向上？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為有什麼特色？又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我和他/她們這些語言表達上的差異？

而或許 McLuhan 所說「媒介就是訊息」的概念，其具體的痕跡，就展現在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為上也說不定。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前面談到，本文起自 McLuhan 「媒介就是訊息」的說法，我想了解，不使用文字做為思維和溝通工具的文盲(或者說，以口語做為主要思維和溝通工具的人)，其口語表達特色為何?而又是什麼原因，造成我與文盲在口語表達行為上有某些差異?

在此，之所以文盲做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即在從 McLuhan 「媒介就是訊息」的觀點切入，探討思維與溝通工具使用差異及以思維或溝通工具使用為首，所創造出的文化環境，對人類口語表達行為的影響。

因為相對於慣用文字做為溝通和思考工具的識字人而言，文盲所使用的思維和溝通工具，顯然大不相同。而這些不同的工具使用，又可能使人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McLuhan, 1964, 葉明德譯, 1978; Vygotsky, 1997)，故而如果在某種條件限制下，文盲與識字人在某些表達行為上，確有明顯的差異，那麼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些差異，某個程度有可能是因為「溝通與思維工具使用的差異」與「以思維和溝通工具使用為首，所創造的文化環境」所造成的。

換言之，我主要研究問題與目的，並非只在說明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為及反應

爲何；更重要的，我想透過文獻探索與所觀察到的現象，說明「媒介環境」及「工具使用差異」對人類口語表達行爲的影響，並提出一套以「媒介環境」及「工具使用差異」爲出發點的口語表達行爲解釋架構。

當然，不只是媒介環境與工具使用差異會造成不同的口語表達行爲，事實上，不同文化、年齡，甚而是階級群體間，由於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在口語表達及反應上，也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這部分在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教育學專門等，都有相當多的研究報告(Finnegan, 1988; Swidler, 1986, 2001; Vygotsky, 1997, 1998)。

例如，人類學者認爲，影響人類口語表達及反應的主要因素，爲週遭的文化環境(Finnegan, 1988)；心理學家強調，兒童的心智發展，對於口語表達及反應會產生影響，像是皮亞傑學派學者就主張，兒童的心智發展，深受其生物性發展的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可初分爲感官操作期、前操作期、具體操作期、形式操作期等階段，在不同的階段，兒童會出現不同的表達行爲(溫明麗, 2003)；社會學者則從社會階級和社群價值觀切入，強調人的價值及信仰對其行爲的影響(Weber, 1946; Parsons, 1951)；教育學家則特別強調，學校教育環境對於語言表達能力及反應的影響(Dewey, 1938)。

雖然上述各學門的研究結果，對於人類口語表達行爲的解釋，有其重要的價值。不過，一來由於這些學說主要論點皆立基其學門立場，並未強調媒介使用對人類思維及行爲的影響性(例如文化學者強調文化的影響，心理學家強調認知發展的重要性)；再者，其研究對象的篩選，與本文所強調的媒介環境與工具使用差異，亦不相同。

例如，心理學及教育學門，由於重視人類心智發展過程的影響，故而其主要觀察對象爲兒童；社會學門則將重心放在階級社群及次文化團體的觀察上；人類學門則從文明及文化的角度做思考，主要觀察的對象爲，生活在不同文明進程的人類行爲。這些研究成果雖有其參考價值，但因其研究對象及觀察角度，與本文強調的媒介環境與工具使用差異有相當大的差異，故而研究者仍需自行發展一套

屬於自己的解釋架構，以說明媒介使用對人類思維與表達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第三節、研究切入角度說明

前面談到，本文主要觀察對象為「生活在此時此刻台灣文化情境下，沒受過文字教育的人」，我想了解這些不識字的文盲，其口語表達行為與反應有什麼特色，及造成這些表達行為與反應的原因為何，並透過這些因素的探討，建立一個以媒介使用差異為切入點的口語表達行為理論。在媒介使用差異這個切入點下，有兩個重點是我所強調的：

一、思維溝通工具

在研究問題及目的中我曾談到，本文起自 McLuhan 「媒介就是訊息」的概念，強調媒介使用對人類心智發展與口語表達行為的影響。在此，我想以思維與溝通工具的使用差異，作為觀察切入點，提出一套人類口語表達行為的初步解釋架構。

之所以思維與溝通工具做為研究切入點，主要即在強調思維溝通工具與人類心智發展和行為表現的密切關連，及其使用過程所創造的文化環境對人類心智技能的影響。因我們大半的思考內容皆由這些思維溝通工具所組成，而人們的口語表達行為又與其思考方式和內容有著密切關係，故思維溝通工具的使用，對於人類表達行為自是有其重要的影響性。

在此，所謂思維溝通工具，主要指的是口語和文字這兩種象徵符號工具 (Salomon, 1979)。雖然某個程度來說，我們也能利用符號、圖像、聲響等媒介進行溝通與思考，但相較於符號、圖像、聲響等媒介，文字和口語，除了被使用的更頻繁外，其系統性、共通性及具文法規則性的特點，也使得人們能夠更有組織的表意及進行思考和理解 (Olson, 1994)，故而其對思維和口語表達的影響性也更為重大。

在本文中，我的研究對象為文盲，由於在日常生活中，他/她們主要的思維及溝通工具為口語媒介，故而我將其稱之為「口語人」。

二、所處媒介文化情境

除了強調思維與溝通媒介的重要性外，另外，我也特別強調報導人所處的整體文化情境，對其思維及口語表達行為所造成的影響。我認為，不只是「媒介使用」這個單一因素，會影響人們口語表達行為，事實上在整個文化環境中，除了媒介使用外，其他相關的社會、教育、語言系統、生長背景等因素，亦是造成人們口語表達行為異同的關鍵要素(關於這部分的論點，請參閱本研究第二章第三、四節的說明)。

而就如 Finnegan(1988)所言，在一文化系統中，媒介使用、社會文化、教育、語言系統、生長背景這些因素，又是緊密結合，不可切割且彼此互相影響。媒介的發展與使用，可能造成其他相關因素的發展，進而導引出更巨大的社會及思維變遷，但其他文化因素的發展，也會限制及影響媒介工具的發明及使用。故而環境中所有因素，可說是處於一種「相生相長」、「相互建構及影響」的狀態下。而在探討所處文化情境的影響時，我們絕不可將媒介工具的發展與使用，與其他相關環境因素完全分離，而需以一個整體文化概念思考。

只是在眾多文化情境因素中，我仍是特別強調媒介使用在環境中的賦能(empower)作用。我認為，雖然文化環境中的相關因素是處於一種相互建構及影響的狀態下，但就如 Vygotsky(1997)所言，在眾多環境因素中，影響人類思維、行為及文化發展最巨的，仍是媒介工具的使用，甚而透過媒介工具的使用，可能促發我們高等思維技能的發展。故而在此，我是以重要的思維或溝通媒介的發展與使用狀況，做為文化的主要畫分依據。採用的是在《口語性與文字性》(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一書中，Ong(1982)所提出的概念，將其畫分為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等情境。

不過既然我所強調的是所處文化情境的影響，那麼本文為何將題目命名為「文字時代的口語人」？因為如果我談的是「此時此刻」台灣的文化情境的話，理當以「電子時代的口語人」名之更為貼切，關於這個部分，我在此做一個說明。

前面我們曾經談到，影響人們思維和行為表達的思維溝通工具，主要為口語

和文字(salomon, 1979)。雖然電子媒介的影像和音樂表現形式，也可成爲我們思考和溝通的工具，例如，我們某些記憶內容，即是由類似電視電影的剪接畫面所組成，偶爾我們腦中也會浮現一些類似電影配樂的音樂，來爲自己的生命處境做些詮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主要的思考和溝通工具，仍以口語和文字爲主。

口語和文字的系統性、共通性和頻繁使用，使其相對於其他媒介使用，對人類思維、行爲與生活造成更重大的影響，而針對「口語」與「文字」媒介使用爲首所創造的文化現象及其影響差異，我認爲是媒介相關研究中，一個更重要且基本的研究方向，而本文也因持此想法，才會以文盲做爲我們的主要觀察對象。

因爲不識「文字」，以「口語」做爲主要思維溝通工具的文盲，某個程度可說是現存台灣文化中，受到最少文字文化影響的一群人，故而在其身上我們將更容易觀察到這兩個媒介工具的影響，及以其爲首所形成文化作用力在人們身上造成的差異，甚而透過較不受文字影響的文盲，可以對比及反思出文字文化在我們這些識字人身上造成了哪些影響。

當然，我並不否認電子媒介所創造的文化環境，對口語表達行爲所造成的影響性，確有許多研究中指出，電子媒介的發明與使用，對於人類生活及溝通方式造成了重大影響(Chesebro & Bertelsen, 1996; Haraway, 1991)。只不過在本文中，我認爲「口語」和「文字」媒介使用，所創造出的文化情境差異，是人類思維、行爲和文化研究中，一個更基本且重要的研究議題，在媒介的相關研究中，是我們必須先做一探索釐清的。而以文字時代正名，其主要目的不在於描述現階段的台灣情境，而是試圖從人類思最基礎和關鍵的發源地，提供一個媒介研究的另類思考。

事實上，雖然電子文化有其獨特的生活及思維方式(Chesebro & Bertelsen, 1996)，但電子文化中的各式現象仍是奠基於文字文化之上發展而來，甚而電視、電影、電腦、網路等電子媒介的使用，也在在可看到文字留下的痕跡，且人們對於這些延伸媒介的使用也必須依賴文字素養方能成立。像是不識英文，但要看得懂外國影片，就要懂得閱讀字幕上的中文字；要上 BBS 站與人交談，就要學會

中文打字。換言之，某個程度來說，電子文化的發展，亦可說是植基於文化文化而來，而在電子文化中，也會殘存一些文字文化的現象。關於這個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與重疊概念，Goody(1977)曾進一步提出說明。

Goody(1977:xii)認為，口語文化的影響，並不是完全在文字文化中消失，而是與其融合，在口語/文字/電子文化間的區隔並非截然二分，而是有其殘留性，故而實際上在從事文化分類時，應以口語、口語加文字、文字加電子等方式畫分。

在本文中，我採納 Goody 在這部分的論點，在其後的文化現象描述時，主要將文盲的所處情境，畫分為口語文化及文字/電子文化兩部分。一來，此畫分方式除了可點出「口語」和「文字」這兩個思維溝通工具的賦能作用及本文對於基礎和關鍵媒介文化差異問題的關注外，再者也能點出文字/電子文化連續重疊的作用力。

從上述的說明，可以得知，「文字時代口語人」此一命名，某個程度除了說明本文報導人所使用的思維溝通工具，並點出本文主要觀察的是，以這兩個媒介工具為首所形成文化作用力的差異外，更重要的，我想透過這個命名，進一步點出本文所強調的重點，即「媒介工具使用」與「媒介文化環境」，對人類思維、行為及生活的重大影響。

當然，不管是對於文盲或是生活在此時此刻台灣情境下的大部分人，我不否認電子文化具有強大影響力，只不過如果我們要了解文字文化和電子文化間的作用力差異，可能在觀察對象的選擇上，不能由文盲身上著手，因為對於這兩種媒介所形塑的文化現象，文盲都不熟練，也難看出其作用力的差異。故而有關文字和電子文化間文化與思維、表達現象的差異研究，可能還須找尋其他的關鍵案例，才能做再進一步延伸說明，而這部分的研究，也是未來學者可努力的目標。

另外，就如本研究副標所示，本文為一初探性研究，文中所提的解釋架構及概念，主要是我在文獻探索及文盲口語表達行為田野觀察間反覆修正推翻過程所提出的初步想像，相信仍有相當程度的不足之處，而這個部分，就有待後續有興

趣的研究者共同努力。

第四節 名詞界定

由於本文的理論架構是由「媒介工具」與「媒介文化」等概念組成，故而在此，研究者有必要將其做一清楚定義及說明。

一、媒介文化

前面談到，在本文中，我特別強調報導人所處整體文化情境對其思維與行為的影響性。不過本文雖以整體文化概念思考環境對於思維與表達行為的影響，但在文化情境的畫分部分，我仍是強調文化情境中媒介因素的賦能性(empower)。我認為，雖然文化環境中的相關因素是處於一種相互建構及影響的狀態下，但在眾多環境因素中，影響人類思維、行為及文化發展最巨的，仍是媒介工具的使用，尤其是思維與溝通工具，故而我引用 Ong(1982)及 Chesebro & Bertelsen(1996)等人的分類，將人類所處文化畫分為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等情境。

在此，我所提的口語/文字/電子文化概念，並非如媒介決定論者一樣，將媒介視為是人類文化進展的唯一決定因素，是一種自我成立自我證成、自動運作的工具，完全獨立於情境之中。而是將文化情境中的媒介使用、教育發展、社會建制、語言系統等各個因素，視為是處於一種「相生相長」、「相互建構及影響」的狀態。例如，我們之所以識得文字媒介，通常是經由正式學校教育而來，而我們的教育內容及文字系統，又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只不過我強調，影響思維和口語表達行為最巨的，仍是思維溝通工具，故而我以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等概念，來說明所處的文化情境。

在本文中，我特別將口語/文字/電子文化等情境，進一步以「媒介文化」一詞名之。關於「媒介文化」一詞，在傳播學中有其獨特的意涵，主要指涉的是媒體的內部文化。但在本文中，我談的是較大範圍的人類生活情境，指的是以思維溝通工具為首，所創造出的文化環境，與傳統傳播學中指涉的意義並不相同。在

此，之所以採用「媒介」文化一詞，主要旨在說明思維溝通工具的使用對於人類思維、行爲及生活所造成的重大影響。

事實上，雖然談論的同樣是口語/文字/電子等文化中的各式現象，但不同的學者尚有不同命名，例如：Chesebro & Bertelsen(1996)是以媒介系統(media system)稱之，Nystrom(2000)則以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命名。

當然，不同的命名有其不同的強調重點及背後的假設，像是 Chesebro & Bertelsen 的媒介系統概念，將人類的生活環境視爲是個相互影響的系統，強調的是其環境系統的邏輯一致性；而媒介生態的論述，則是強調我們所生存的環境是個類似生物學中所談的生態概念，會相互影響，自然有長有滅。

不過 Chesebro & Bertelsen(1996)和 Nystrom(2000)等人的「媒介系統」與「媒介生態」的說法，雖然都強調媒介與環境中各個因素相互建構與影響的關係，但事實上，其所採用的「系統」與「生態」的概念，較少處理「人」與週遭情境互動關係的說明，也未點出我們所處的環境實爲人類所創的重要概念，在有關環境與人類互動問題的討論上，很容易讓人認爲，人類是處於一個較被動的狀態。

爲了避免造成「系統」與「生態」概念的缺點，本文特別將人類生存的情境以媒介「文化」稱之。在此，之所以使用「文化」一詞，除了強調我們所處的環境爲人類所創的積極性概念外，另外我也特別強調文化情境對生活於其中之人所造成的浸淫影響和文化所具有的傳承性及流動的變異性。我認爲，在文化及文明演進的過程中，先前文化中的許多思維與現象，仍會傳承至目前所處的文化情境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就如同生活在電子時代的我們，身上可能仍保有文字文化和口語文化的某些思維習慣；但人類在文化演進過程中，還是有其積極的創造性，故而我們所處的文化情境仍具有某種程度的流動與變異性。

由於強調文化所具有的可傳承特質，故而本文所述「口語/文字/電子」等文化情境的畫分，並非是個截然二分的概念，而是以一種連續和混合體的方式存在。在此，我們可將口語/文字/電子視爲是個連續集，在此連續集中，所有文化的樣形都是以混血和重疊的方式存在。故而如果我們要爲連續集中的某個文化分類，則我們可以說，該文化較「偏向」口語/文字/電子文化，但較無法明確指出，這個文化的樣態就是純由口語或電子等文化形式所組成，而未有任何其他媒介文

化的作用力。

事實上，現存文化中，大半同時包含了口語、文字和電子文化的作用，只不過不同的媒介文化，在其中所造成的作用力有其大小罷了。現在要說有一個所謂的純口語文化或電子文化的存在，已不太可能。因為交通的發達，許多傳教士及人類學者，已將各式的電子媒介帶到原始步落，而也如前面所述，文化的發展是種傳承的過程，在電子文化中，我們仍難避免受到口語和文字文化的作用力。

故而我們只能說某個文化較「偏向」口語、文字或電子文化的樣態，而不能說某個文化就是口語或電子文化。在本文中，爲了強調媒介文化情境的連續和混合特質，我特別將所處文化情境以口語/文字/電子文化「偏向」名之。在我所謂的口語文化偏向中，並不排除文字、電子文化影響性的涉入，只不過文字、電子文化的影響性，可能不像口語文化對生活於其中的人，作用力那麼大罷了。

二、媒介工具

前面我們談到，不同的媒介工具使用，會造成不同的思考方式，而我們的口語表達行爲又與思考有著密切的關連，故而在思考一個人的表達行爲問題時，我們必須回歸到其所使用的媒介工具上去做思考。

不過在本文中，我們所談的媒介工具並不具放諸四海皆準的普同意義，因人們在使用及思考某個媒介工具的意涵時，很難不將自身的詮釋意義加諸其上，而我們的詮釋又深受文化情境的影響。亦即，所有的媒介工具，皆是種文化產物，也具有其獨特的文化意涵。故而在本文中，我採用 Swidler(1986)的說法，將 McLuhan(1964；葉明德譯，1978)書中的媒介工具，不再侷限於傳統傳播學中所定義的大眾媒介或物質工具，而是將其定義爲人類日常生活中，用來解決各式問題及達成目的或意圖的文化工具箱，是那些深具文化意涵，經由某個文化情境所形塑的常備技能工具。

在此，所謂的文化工具箱，指的不只是有形的物質工具，像是語言、文字、九九乘法表等，同時也包含了各種價值、觀念、儀式、習俗等無形的文化工具。

而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式行爲，即是透過這些文化工具箱的選擇使用而來，但在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的同時，我們的思維及行爲亦受其影響和限制。

另要說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文化工具箱概念，與口語/文字/電子文化連續集的概念相同，同樣是種「偏向」概念，亦即，文化工具箱的形成與使用，並非處於一種截然二分的狀態，而是種習慣的傾向，故而不論識不識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能都會使用某些口語文化的工具箱，只不過相對來說，在口語文化工具箱的使用技能和頻次上，口語人可能較文字人更爲熟練與頻繁罷了。換言之，某些文化工具箱，也許較常在口語文化偏向或口語人身上使用，但並不意謂著文字/電子文化偏向或文字/電子人，就不使用這些文化工具箱，只不過相對上來說，使用的技能和頻次可能少了些。

第五節 研究取徑說明

一、方法論立場

傳統上，心理學及教育學門，在有關心智反應和口語表達的研究中，通常是採量化研究的方式進行，即以實驗的方式，進行假說的驗證或相關因素的探究。例如，認知心理學在測試兒童的記憶或語言表達能力時，會透過分組的方式，提供某些基本的測驗問題或機器，測試人類記憶或語言表達能力。而這種實驗室的研究方式有個好處是，研究者可以對於影響研究的變項嚴加控制，也可對研究的因果關係，提出一個較符合傳統科學要求的說法。

不過，這種幾近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否適用於人類行爲的研究上，近來卻受到強烈的質疑(Neisser, 1976; Cole, 1996)。

Neisser(1976: 34)認爲，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空間、時間和事件所組成的綜合連續體，是研究情境中很重要的面向，但是這些面向在實驗研究中，卻常被忽視。Cole (1996)則進一步指出，實驗室的研究情境，對於人類的語言表達行爲，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實驗室的操弄方式，將使得研究結果，與我們真正想要解釋的日常生活現象，變得毫不相關。

Labov(1970)和 Slobin and Welch(1973)等人的研究發現，如果研究者以一種測驗或測量的心態進行，即便研究情境為受試者的日常生活情境，其研究結果仍有很大的失真可能。Mehan(1979)則為文指出，即便受試者對於測驗的主題很有興趣且不畏懼測驗的題目，和主試者也使用相同的語言，但是對於那些被測試的人來說，這樣的情境，仍會限制受試者的測驗反應。例如，受試者會因為知覺到主試者知道問題的答案，且他們必須以主試者所使用的詞彙來回答問題，但是他們不見得又不見得知道主試者要的是什麼樣的詞彙，常會以一種不自然的方式回應。換言之，如果我們以實證的實驗方式進行研究，反而很可能影響到報導人的口語表達行為。

在此，我採用的是質化研究中，以建構理論為最終目標的紮根理論法。即在研究一開始，我並非由一個很清楚的理論或假說開始(但絕對有一個觀察切入角度，在此我要觀察的是口語表達行為)，再由文獻及田野資料的搜集，經過歸納及演繹過程，發現及建立理論假設，再由假設出發，進行反覆推翻修正的過程(徐宗國，1996)。即在研究一開始我直接進到田野，觀察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為，再由她們的反應回頭去探尋相關的文獻資料。

事實上，誠如前面所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旨在透過文獻探索與所觀察到的現象，提出一套以「媒介環境」及「工具使用差異」為出發點的口語表達行為解釋架構。亦即，我主要的目的是在建構一套解釋架構，而非驗證某個理論，故而採用以理論建構為目的的紮根理論，顯然比假設驗證的實驗法來得更適當些。

在田野觀察部分，主要使用的是參與觀察法。即我盡量以報導人日常生活最自然的方式與其相處，觀察其日常生活的口語表達行為。

當然，我也知道，要讓一個人在最自然的狀態下與你相處，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開始總會有些隔閡，再加上對方知道妳是來觀察和採訪她的，很容易就會表現出不自然的行為。而這個隔閡打破，唯有在與報導人建立起一定的友誼之後，她在你面前才不會那麼拘謹，也會以較自然的方式表達自己，而在這時候，也才能開始進行觀察。換言之，如何與報導人建立起互信的

關係，是我進入田野的一個關鍵。

在此，我採取的策略是長期與其互動，像是如有可能我會經常去報導人家中拜訪，甚而在報導人家中長住數日，或是住其附近，再找機會與其聊天，建立關係。由於我的報導人大半都是透過親友間以滾雪球的方式介紹而來，這些報導人大部分都是這些親友家的長輩，故而要居住在報導人家中，對我而言倒不是件難事。而也透過這些親友的引介及陪伴，我慢慢和這些報導人建立起一定的情誼。

二、研究樣本篩選

前面提到，本文的目的在於從媒介文化與工具使用差異的觀點，建立一套解釋人類口語表達行為的初步理論架構，文盲的表達行為，是我發展理論及說明的一個關鍵例子。故而，在本文中，我除了需對相關研究資料做一搜集整理外，另一個重要的研究工程，就是觀察文字時代口語人的口語表達行為，並從與其互動過程中，發展我的理論架構。

不過如果真要進行實際田野觀察的話，那麼首先我要面臨的是，何謂「文盲」這個問題。換言之，我如何定義文盲？我又怎麼知道我的報導人³是文盲呢？

（一）何謂文盲

關於文盲的定義及篩選問題，一直是我研究的難題。首先，在以國語做為正式學校教育語言的台灣社會中，有人可能會認為，文盲就是不會說國語的人。但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我發現許多老人雖然不太會使用國語，但卻受過正式的日本學校教育⁴；另外有些人雖沒受過正式學校教育，但透過教會系統的教導⁵，也習

³在本文中我以「報導人」稱呼我的研究對象，主要在於與實驗法中的「受試者」稱謂有所區別。在本文中，我並不以測試心態進行研究，故而不以受試者稱呼我的研究對象。

⁴小文的阿公不會說國語，原本我以為找到了個文盲的樣本，但後來發現，他曾經受過日本教育，會唱卡拉OK，甚至會讀報紙，後來我進一步測試他，請他將報紙裡的文字讀出，結果發現，他的文字和發音，完全是以閩南語做連結。換句話說，他所閱讀的文字，完全是以閩南語發聲。

⁵到澎湖七美做訪問時，我遇到一個完全沒進學校受過教育的阿婆，她告訴我她會唱歌，我覺得很高興，急著想問她怎麼記得起這麼多歌詞。她從房裡拿了本聖歌教本，告訴我這些歌都是從這本歌本來的。接著她一字字的將聖歌的歌詞用閩南語唸出，為了測試她識不識字，我隨意寫了些字測試她，並刻意問她牆上日曆上的字是什麼，結果她都答對了。後來我還不死心的要她解釋歌詞的意義給我聽，結果她說的頭頭是道，每個字的意義都解釋的清清楚楚的。這時候我才驚覺，在台灣，其實宗教聚會也是個非常好的教育場所，即使這些老人只是到教堂學聖歌、唱詩歌，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耳濡目染之下，大家也都識得許多字了。我甚至認為這些老人學的東西可能比

得了大量的文字，並具備初步的寫作能力。故而會不會說國語，有沒有進過學校，可能可以做為初步篩選的一個機制，但是，是不是真的不識字，還是要透過親身接觸及進一步的了解後才能確認。

其次，在尋訪樣本的過程中，我必須要說，在台灣，因為各式資訊的充斥，媒體的普及，以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推行，目前要找到所謂完全不識字的文盲可說是非常困難。有許多人雖然沒進學校受過教育，但因受媒體或子女的影響，或多或少識得一些簡單的文字，像是數字、自己或家人的姓名，許多我所接觸的文盲，就認得十個阿拉伯數字。換言之，如果純從完全不識字的這個角度來檢視的話，台灣目前可能很難找到文盲。

既然有無受過學校教育及識不識簡單文字，都不能做為評判標準，那麼台灣官方又是如何定義文盲的呢？根據主計處的定義，所謂識字者，指的是「年滿十五歲以上之人口，在日常生活上能閱讀普通書報並有書寫簡短信件能力者，反之則稱之為不識字者」。故而，文盲指的則是那些不能閱讀普通書報，且沒有書寫簡短信件能力的人。但這項定義除了沒有明確的具體操作說明外，且所涵蓋的範圍也過於廣泛，因為如果依照其定義，台灣可能有一半受過正式國小教育的人，都可被歸屬於文盲的類目中。

關於文盲的定義，美國教育部曾在 1993 年九月份，公佈了一個有關成人識字的歷史性研究，在此份報告中，當時的全國成人識字調查小組(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對於識字的定義，除了強調識字的定義必須隨歷史情境而有所不同，像是美國建國前，能在文件上簽字就算識字，但在現今社會中，所謂的識字，還包括個人對各類文字資料、圖表的了解、比較和分析；另外，該小組也特別強調「文盲」與「識字」間，不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類目，而應被視為是一連續狀態，並無特定的界限或臨界點(West, 1993)。全國成人識字調查小組(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並發展出一套測量識字能力的量表，將識字能力分為五個

我還多，因為在歌本後面有個以羅馬拼音做成的閩南語歌本索引，我看她一字字的用羅馬拼音拼出文字的閩南語版，真是覺得自嘆不如，因為我還不會用這種拼音方法拼出閩南語。

等級，分別從文章認識、文件認識及數字認識三大部分去做測量。

在此，美國所訂定的識字標準，雖較台灣明確，且依據歷史情境而有所改變，但其所制定的標準，仍與主計處所提的識字標準一樣，過於嚴苛，因為如果從測量結果來看，可能大部分受過正式小學教育的受訪者，都會被歸於文盲的類目中。

要怎麼處理這個難題？是我田野調觀察工作的一大難題。一開始我一無頭緒，後來在與小琪大姨的採訪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文盲認知的特別現象。

根據小琪大姨的自述，她是個文盲，從小沒受過任何正式教育，也不識字，不過她有一項奇特的技能，就是不識字的她，竟然會打麻將，從嫁到開賭場夫家至今，也打了二十幾年，而且經常贏多輸少。初時我非常好奇，因為麻將牌上明明就有好多中國字（東、西、南、北、中、發、白、萬等），為什麼她說不識字呢？在一次打完麻將散場後，我把她留下來問了些問題。我想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識字（因為打牌時，她打出二萬，還會好心的提醒其他牌搭子，她打了二萬，我看她明明就知道這是什麼字）。

我在紙上寫了個「萬」字，問她這是什麼字，她告訴我，她不知道這是什麼字。我又試著寫了個「發」，結果還是一樣。後來我拿起放在一旁的麻將牌「三萬」問她，這是什麼，她馬上答道：「三萬啊！」，試了幾次我才發現，原來她的訊息是以圖形入碼，她只記得整顆牌上的形狀，而不是一個個的文字，所以當我將三萬拆解成二個字時，她就分辨不出來了。

這個發現讓我相當興奮，後來我試著以這種方式進行文盲的篩選，結果發現大半報導人都答不出正確的答案。不過後來我去美國參加一個會議時，卻發現一個令我困惑的現象，就是這個圖形入碼的資訊處理方式，不見得只出現在文盲身上，事實上，只要是不識該國文字的人，都可能以這種方式處理資訊。

在紐約搭地鐵時，我看見一個年輕人手上刺了中文刺青-「大師」二字，不過有趣的是，他把大字刺的很大，「師」字則是小小的連在大字之下，看起來就像個圖形，我原先覺得很有趣，他怎麼會把這兩個字連在一起，因為這明明是兩個不一樣的字，後來繼之一想才發現，原來那兩個字對他及那個刺青師來說，只

是個圖形罷了，他不知道這是兩個不同的中文字，所以才會將它們刺在一起。其後我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這種狀態。

某次，我在某家小吃店裡，看到有個泰國女性在看一本泰文書，我很好奇跟他要求可以讓我看看嗎，結果發現，我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斷字，因為那些文字對我來說，真的就像是圖形。

這些現象不只反駁了我所提出的，只有文盲才會以圖形入碼的假設，也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假設可能有些問題，因為不只是文盲，連我這個識字人都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以圖形的方式去識字。換言之，我必須另起爐灶，再從田野觀察與文獻中，提出另一個分辨文盲的方法。

後來在田野觀察中，我又發現了另一個原先我認為是文盲特有的認知現象，即雖然認得十個阿拉伯數字，但是大半文盲對於這些符號具的解釋，是與台灣社會所定義的符號義有所不同。

像是我以 1384 四個阿拉伯數字，請她們告訴我這個數字是多少，結果她們往往無法說出它的正確符號意義，例如，阿玉會把它說成一百三十八元四角，林嬭則是用一加三加八加四得出十六的答案，而且更有趣的是，她們都各自有一套自己的邏輯。例如，阿玉最大的算數單位就是百位，林嬭在說明完十六還會告訴你，這個答案看妳要怎麼算，如果是加一個零就是一百六十，加兩個零就是一千六百。

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她們絕對有「千位」、「萬位」的概念，因為阿玉先生每個月給她的生活費就是好幾萬塊，且要付和收的互助會錢也是上萬，甚至是數十萬。只不過她並不知道，這些金錢概念是與我所問的數字相連結。換言之，文盲的符號具與符號義間的連結，是與我們定義的方式不同。

雖然這個認知現象，也許是文盲的思考特色，不過，後來我卻發現，識不識得某個文字或數字的符號意涵，還是不能成為篩選文盲的依據。在田野觀察中，我發現有個八十幾歲的老婦人，她沒進過正式學校，也不識字，但因早年從商的關係，對於金錢相當有概念，甚至了解六位數字所代表的符號意義，也會使用直

式來做加減運算，不過，對於大半文字所代表的意義，她還是一無所知。

事實上，這個篩選標準還是有其問題，因為對於許多外國識字者而言，如果我以中文請他們說明該符號具的意義，他們的定義也和文盲一樣，是與台灣社會所定義的符號義大不相同，但他們卻是識字的。換言之，對於數字符號及文字符號意義的理解，或許可做為初步篩選的依據，但還是不能說明這個人到底是不是文盲。

經過這些反思的過程，我決定以求學經驗、自我報告及數字和文字符號意義的理解程度，做為篩檢觀察對象的主要依據。一來，就如同前面「偏向」概念所述，在目前的台灣情境下，要找到一個純的「口語人」可說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再者，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事實上，就如前面文獻及美國識字調查小組所言，口語-文字-電子文化並非截然二分，而是一種偏向，我們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上述三種文化偏向的影響，我只要找到一些更具口語文化偏向特色的人，成為我的研究對象即可。

而那些自述未接受過正式學校教育，及不識大半文字的報導人，即使不是真正的純文盲，但不論從早年的生長經歷，目前所處的居住情境和所受的教育來看，都可以算是在這個充滿文字的時代中，更「偏向」口語文化極端的人。

我目前收集到的個案共有十五人，主要來自於高雄縣、台南縣、台南市、台中縣、彰化縣、澎湖縣等六個縣市。這些報導人全都為女性，年齡從五十歲到八十幾歲都有。在本文中我所提出的解釋架構，除了源自於文獻的思索外，有一大部分，即是透過與這十五個個案長期的互動觀察而來。

三、書寫方式

前面談到，本文的方法採用的是質化研究中的紮根理論，不過雖然我採用紮根理論所強調，未帶任何預設成見先進入研究場域的精神進行觀察(即在研究一開始我直接進到田野，觀察文盲的口語表達行為，再由她們的反應回頭去探尋相關的文獻資料)，但由於紮根理論的研究過程，研究者必須來回於文獻與資料間，

而如果以此方式書寫，很可能使得研究內容的呈現有過於散亂的危險。在此，爲了便於敘述與閱讀的關係，我在資料處理及撰寫上，主要是以文獻的說明及邏輯推演爲主。亦即，在研究進行時，我雖採用紮根理論的先進入田野觀察與反覆推翻修正的精神，但實際的資料的處理及撰寫上，我並未以紮根理要求的方式呈現，關於此點，在此需先做個說明。

由於本文的研究問題與目的，在於提出一套以「媒介環境」及「工具使用差異」爲出發點的口語表達行爲解釋架構，故而我將研究書寫重心擺在解釋架構的呈現上。在此，爲了敘述及讀者理解的方便，在解釋架構的書寫上，我是以文獻的說明及邏輯推演爲主，再適時補充一些田野觀察的資料，以與文中所提的文獻做一對話。

不過雖然本文在解釋架構的書寫上，是以文獻的說明及邏輯推演爲主，但實際理論架構的得出，仍是透過文獻整理與研究者針對十五位文盲口語表達行爲田野觀察間的反覆激盪而來。換言之，實際研究的進行，並非如我在文獻書寫部分所呈現的那麼線性，也非只是純由文獻而得，只不過爲了理解的方便，我是以文獻和邏推演做爲主要的書寫方式。

另外，爲了說明及解釋我的解釋架構，在本文第四章，我會利用阿玉這個個案，更具體說明及延伸我所提的概念及內涵。在此，阿玉這個個案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來「說明」前述的理論架構，使讀者更便於理解本文所提出的解釋觀點，而非「驗證」前述的理論架構。換言之，透過阿玉這個個案的說明，我希望自己所提出的理論架構能更具體的被了解，但絕不意謂著我想透過阿玉這個個案，來驗證我的解釋架構，因爲如果談到理論驗證的話，光是在樣本呈現的部分，阿玉這個個案就已顯得過於單薄。至於我所提解釋架構的適用性，並非我這個研究的處理重點，應是未來我和其他有興趣學者更進一步努力的目標。